

资本主义裂缝与抽象劳动危机^{*}

约翰·霍洛威/文 邝光耀 夏 巍/译

[译 者 按] 自治主义的核心是否定性和替代性的行动。自治空间或自治时刻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了与资本主义主流逻辑的断裂，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中断或逆转。“我们不接受异化对我们行动的外部决定，我们将自己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否定是拒绝接受异化的决定；我们反对这种外部强加的行动而主张一种我们由自己选择的行动，即意味着一种替代性行动。本文认为，理解“自治”（autonomies）概念的关键是一种“行动”（activity）形式对另一种的反抗，这种反抗可以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结合起来，并认为自治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应当被理解为抽象劳动危机的表现。

[关 键 词] 资本主义裂缝 抽象劳动危机 马克思主义 自治 革命

一、引 言

自治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仅关涉到对资本的普遍敌视，还强调资本主义

^{*}原文来自 John Holloway, *Cracks and Crisis of Abstract Labour*, *Antipode*, vol. 42, no. 4, 2010, pp. 909-923, 经授权发表，译文有部分删节。

作者简介：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无需夺权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被译为1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译者简介：邝光耀（1999—），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夏 巍（1977—），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33。

在此时、在当下正发生着的强制的特定抽象劳动，并且力图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资本强制。针对资本主义的行动模式，自治主义设定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行动，并澄明它们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我们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一种是由外部强加而主体被动遭受的——要么是直接令人不愉快的行动，要么是我们拒绝接受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行动；另一种则是推动自治、自决的行动。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行动，的确需要两种不同的概念范畴来加以定义。本文将遵循恩格斯在《资本论》脚注中的建议，将前一种活动称为劳动（labour），将后一种活动则称为行动（doing）。^① 因此，自治主义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对劳动的反抗。

本文论争的第一个对象，是将这些“行动式抵抗”运动仅仅视作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人类生存斗争的一部分的理论意见。在这场针对抽象劳动的斗争中，无论选择如何，我们事实上都参与其中（站在一方或另一方，或者通常是双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意见是学术性的，因为它们受到大学教学结构和传统模式的青睐。尽管我也是一名大学教授，但我认识到大学并不是讨论自治问题的最佳场所。相反，正因为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我强烈意识到学术工作的要求同科学研究的挑战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扩大。在目前的历史形势下，我认为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必须针对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的自杀式冲动。换言之，留给我们的唯一科学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摆脱这种混乱？其中包括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阻止这个自我毁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复制和再生产？这已经是一个在大学理论研究的框架内越来越难以提出和回答的问题。

第二，这一论争是针对那些主张要放弃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斗争指导思想的学者。的确，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讨论已经脱离了当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实际方向，以至于许多新社会运动的活动家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斗争无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抛弃马克思将很容易导致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兴奋和绝望之间的不断摇摆，也将导致对阶级斗争成就的过分高估和困难到来时的过度沮丧之间的不断摇摆。

第三，这里的论争还针对那些几乎只关注其成就的自治主义理论。宣扬自治主义当然极为重要，但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显然必须更公开、更充分地谈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批判的第四个理论对象，是那些因过于轻率地承认自治主义运动的困难转而忽视其重要性的观念。自治主义运动确实经常失败，有时甚至是可悲的或可笑的失败，例如被融入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分散结构之中。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哪条路可走呢？是再度回到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之中吗？不，最好的办法是将困难视为挑战，而不是取消主体行动 的资格。

^① 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页。

第五，这一论争针对的是那些只意识到劳动的单一维度而忽视了马克思强调劳动二重性之重要性的理论。这往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点，并通常与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定义（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的斗争可能被视为也可能不被视为新社会运动的“非阶级”斗争的补充。本文反对这些观点，并认为革命斗争不是围绕抽象劳动的斗争，而是反对抽象劳动的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反对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反对资本逻辑对自己的身份分类。

第六种批判的理论对象，是那些虽然出色且正确地强调了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但只集中于关注抽象劳动的理论。这些理论观点要么假设具体劳动的范畴本身存在问题，要么断定它完全包含在抽象劳动之中。这种理论把矛盾从社会对立中分离出来，因此尽管它的确把对资本的批判理解为抽象劳动批判，但如果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或行动之间的关系不被理解为活生生的对立，那么这种批判就仍然是抽象的。这些理论的观点有时令人振奋，但在政治上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把我们再度带回到一个旧结论，即认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必要的，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一无所知。

第七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本文反对那些——通常是受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或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影响的观点，将资本的中心地位作为理解当前社会关系对抗性质的核心范畴的观点。本文的观点是，核心范畴是我们的行动，具体而言是我们日常行动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行动服从于抽象劳动，换言之，我们的行动受制于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价值的不断膨胀和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围绕抽象劳动为中心的组织方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予以改变。因此，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行动”对抽象劳动的反抗。所有人对我们自己的行动实行自治自决，最终的结果将是资本的解体。相反，如果我们仅用争取民主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反对资本的行动斗争，那么我们实际上就稀释、淡化了这场斗争，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忽略这一点：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体制本身不会改变我们日常行动的形式和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资本范畴视为中心问题：资本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本质上是人类行动的一种特定历史组织形式。

本文暗含批判的第八个对象是“自我价值稳定”（selfvalorisation）概念，这一术语由奈格里发明，并被广泛应用于自治主义运动的讨论中。根据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的观点，自我价值稳定“表明了自治的一种价值化过程——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到一个自我定义、自我决定的过程，它超越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单纯抵制，而且是一个积极的自我构建过程”。^① 后来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提到“许多自我价值评估或自我

^① 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Werner Bonefeld(ed.), *Open Marxism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 134.

构成的过程,都逃避了资本的控制”。^①显然,我们正在谈论并试图理解同样的反叛过程。让我担心的是,这些过程是“独立于资本主义价值论”或“摆脱资本控制”的概念。出于4个相关原因,我更倾向于坚持认为,他人行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关系。首先,存在一种危险,即自我价值观,或实际上是“出走”(exodus)的概念,可能会造成一种具有欺骗性的稳定形象。正如我们在关于裂缝(cracks)的困难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将裂缝视为转瞬即逝的断裂点或断裂的时刻可能更有帮助,这些断裂点或断裂时刻具有短暂的存在,并且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重组才能存活。第二,自我价值稳定可能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这可能是源于拒绝劳动的特定形式的一种激进主义,(正因此克里弗才认为“拒绝工作……创造了自我价值观的可能性”^②),而“行动”的概念将对抗定位在行动的过程中,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是作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很简单,生活就是行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第三,自我价值稳定的概念并不像劳动的二重性概念那样能引导我们批判抽象劳动及其表现形式。最后,自我价值稳定作为价值的外在形式,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危机,而行动则是抽象劳动的危机。

最后,本文的观点对这样一个概念提出了异议:即我们的反抗或其他自治主义行动的空间或时刻是存在于资本体系之外的;资本并不与其他形式的行动并存。相反,资本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的物质霸权力量,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形式,这种社会关系被强行并不断地附加于世界上的所有主体行动之中。因此,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行动”形式,“行动”则存在于反对和超越这种形式的活动之中,如公开或未公开的反叛运动。举个例子,与我们的孩子玩耍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外进行的活动;相反,与孩子们玩耍是在资本逻辑中进行的(因为我们复制了资本主义的权威模式),反对资本(因为我们拒绝这些权威模式,并在坚持玩游戏的重要性方面反对资本)和超越资本(因为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的断裂点,我们创造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世界,但总是作为斗争,总是处于危机边缘)同自我价值稳定的概念一样——外部性的概念很容易导致概念自身的实证化,最终远离了核心性的现实对立。总之,生活是一场与资本主义行动形式的现实斗争。

二、行动与裂缝

主体行动的选择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动机和道德动力。我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

^① 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Werner Bonefeld(ed.), *Open Marxism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 134.

^② 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Werner Bonefeld(ed.), *Open Marxism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 130.

奉献给我们喜欢的或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那些行动。因此，我们拒绝金钱至上的逻辑或资本的要求，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更公正、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为建立一个基于相互承认主体尊严的共同体而奋斗的世界，这在道德意义上是令人满意的，亦能够满足个体的需要。但困难就在于，我们采取不同行动的尝试违背了资本主导的社会逻辑，即由资本增殖的逻辑所主导的社会整合模式。原因在于，那些被我们所拒绝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紧密组织的一部分，更是资本形成强制、连贯的抽象化生产逻辑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支配着主体获取生存资料和生产手段的方式。拒绝这种逻辑并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式，意味着我们将很难获取生存必需品，也难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用以进行创造性行动的生活资料。因此，选择行动就是选择了被排斥：被排斥在一个显然正在摧毁人类生存基础、但同时也是人类目前繁衍基础的资本逻辑之外。

然而，我们的替代性行动总是存在于不可能性的边缘。对资本逻辑而言，这些行动本不应该存在。但它们确实存在着：即使总是脆弱地、往往是短暂地存在着。替代性的行动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并总是有被随时消灭的危险，或者更糟糕的是，自治主义行动被重新融入资本的主导逻辑当中，进而转变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或社会制度的新要素。但我们始终明确的是，它们即使本不应该存在，但它们确实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扩增着。

我们可以将这些自治主义行动的空间或时刻视为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的“裂缝”。虽然它们还并不是真正的自治，因为它们事实上并不完全自我统治，但它们是朝着某个方向不断推动着。另一方面，它们同时被反向推动着——因为这些行动与资本逻辑相对抗，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消极否定意义上的而不是积极肯定意义上的概念：“裂缝”而不是“自治”。“自治”这一问题在于，它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同一性的理解。“自治”首先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时空单位，即我们已经成功逃逸到资本逻辑之外的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构建或发展独特的身份和差异性。然而在一个基于否定性自治或自决的世界中，静态意义上的自治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决事实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断推动自决，换言之，推动反对和超越对自决的否定，并作为这一动力的一部分，进而创造我们生活在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中的那些极其脆弱的空间或时刻。

裂缝是一个否定且不稳定的概念。裂缝是资本主义同一性逻辑的断裂，也可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结构的断裂。由于资本逻辑的支配是一个始终动态的过程，因此裂缝也决不会静止。它们不断运行、延伸、扩展，并与其他裂缝进行连结、填充、覆盖、再现、倍增。在此过程中主体突破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其自身的身份定义。因此，裂解资本主义的理论必然是批判性的、反同一性的、否定性的，同时也是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理论。事实上，生活中到处都有资本主义统治的裂

缝。例如，今天我不去上班，因为我想待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这一决定可能不会产生如“萨帕塔起义”^①那般的巨大影响，但它们却有着相同的内涵：“不，我们不会做资本逻辑告诉我们的事，相反，我们只做我们认为必要或可取的事。”对这些行动最明显的思考方式是萨帕塔运动基于空间角度作出的思考（“在恰帕斯，在这个社会中心，我们不会屈服于资本，我们会做其他事情”），但我们没有理由不从时间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又例如，“在本周末，或本次研讨会期间，或尽可能长的时间内，我们将全力以赴建立违背资本逻辑的关系”）。或言之，我们的挑战可能是主题性的，又或者与特定类型的资源或活动有关：例如我们不允许水、教育或软硬件设施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这些必须被理解为公共资源，我们将根据不同的逻辑进行行动等。

对资本逻辑的反抗无处不在，最通常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它们。一旦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裂缝上，我们对资本统治空间的印象也将不断变化。世界地图不仅是一张资本统治的地图，它同时也是一张自治行动反抗的地图，一张关于裂缝不断打开、延伸、运行、连接、关闭、倍增的地图。我们越关注裂缝，世界的不同形象就越开放，这是一种反地理性现象，不仅逆转了空间性的迹象，而且挑战了地理维度本身。只有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革命只能是承认、创造、扩大这些裂缝：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显然，这些否定性、创造性的裂缝式空间与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自治主义空间，而是试图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逻辑。它们受到国家的压制或同化，受到被我们拒绝的社会中获得的行为模式内部复制的威胁，也许最严重和最阴险的是，这些裂缝将不断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腐蚀和市场规则的威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它们似乎不应该存在。从资本主义理性的角度来看，它们被看作是逻辑上不可能、荒谬乃至疯狂的。然而即便如此，日益增多的对劳动的反抗却始终存在着。

三、劳动的二重性：反对并超越抽象劳动

这些存在于体系中的裂缝可以是反系统性的运动，也可以是反对社会体制强制性的运动。如果我们把这个体系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那么这些裂缝就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而不论是否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虽然这些裂缝式运动不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唯一形式，但它们的确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反抗形式。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上被认为最重要的反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否与对这些运动的理解有关？许多新

^①“萨帕塔起义”（Zapatistas movement），指1994年起，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反新自由主义，并受到全球声援的原住民起义运动。“萨帕塔起义”运动被认为是第一场后现代意义上的自治主义革命运动，亦是作者霍洛威用以构建反资本主义革命策略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译者注

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拒绝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与他们斗争毫不相干，相反，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恰与他们所拒绝的斗争形式密切相关，即工会、改良主义和先锋队等革命党旧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似乎的确只停留在自己的理论世界中徘徊不前，并且与当下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浪潮相去甚远。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相关性问题无论对于这些运动来说，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明确的是，裂缝（或自治）是对抽象劳动的反抗，是一种行动形式对另一种行动形式的反抗。主体的行动本身具有双重性、自我对抗性。而这种双重性、自我对抗性，或指马克思所称的“劳动二重性”，正是马克思著作的中心主题。因此，任何关于裂缝、关于反抗抽象劳动的理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区分了异化劳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两种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自我决定的、有目的的活动，它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生命活动反而以异化劳动的形式存在，这种劳动最终成为了一种似乎不被主体控制的，将我们与我们的同胞和其他物种分离的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再使用“异化”“异化劳动”这类词汇，但他仍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坚持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①因而也是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道：“我的书中最好的观点是：‘1）劳动的双重性质，取决于它是表现为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所有对事实的理解都取决于此。第一章立即强调了这一点。’”^②

《资本论》中的劳动二重性是指抽象劳动和有用（或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并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即作为从其劳动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劳动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作出的区分是他早期区分异化劳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进一步形式发展。具体劳动无论其发生在哪个社会形态，都是创造性的或生产性的人类活动（或行动）；而抽象劳动是一种非自我决定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一切特殊性的质的内容都被同一化为普遍性的量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我们的行动被转化为抽象劳动。抽象劳动被视为一种缺乏具体内容特性的活动，一种要用商品交换中的其他活动来进行量化或衡量的活动。这说明抽象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它还反映了行动本身的内容被抽象化的事实。例如，一开始我烤蛋糕，是因为我喜欢烘焙，或者因为我喜欢吃蛋糕，又或者因为我喜欢和朋友分享，又

^① 译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② Karl Marx, Letter from Marx to Engels, 24 August, in Karl Marx (ed.),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2, London: Lawrence & Wishar, 1987, p. 407.

或者是因为我为自己做出来的蛋糕感到骄傲。然后我决定试着以烤蛋糕为生，通过烤蛋糕并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取利润。渐渐地，烘焙成为了我获取足够生活收入的一种谋生手段。这导致我必须以一定的速度和高效的方式生产蛋糕，这样我才能保证以足够低的价格来销售它。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享受已不再是烘焙的一部分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通过烤蛋糕仍然没有办法挣到足够多的钱，我想，既然制作蛋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为了达到赚钱目的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只是一种挣钱谋生的方式，那我还不如做一些其他会卖得更好的东西。此时，我的行动已经变得完全漠视了其内容特性，换句话说，它的具体内容特征已经完全被抽象化了。最终，我生产的劳动对象现在已经与我完全疏离了，我不在乎生产的究竟是蛋糕还是老鼠药，只要它能卖出去就行。更重要的是，这种抽象化不仅将我们的行动转化为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完全陌生且压迫自身的东西，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凝聚力被塑造出来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人的行动正是通过这个抽象过程聚集在了一起。例如，当面包师出售蛋糕并用这些卖蛋糕得来的钱去买衣服时，面包师的行动和裁缝的行动之间的社会整合就通过对他们劳动的纯粹定量衡量而建立起来了。将“行动”抽象为“劳动”（或将劳动从具体的行动中抽象出来）对行动的人来说既是一种直接的压迫，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游离于任何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之外的社会凝聚力（一种制度）。这正是我们的裂缝和自治所必须要拒绝的资本主义社会凝聚力。

《资本论》的中心主题是抽象劳动和具体行动之间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创造了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二重性构成了对个体劳动过程（劳动过程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和集体工作过程（一方面是合作，另一方面是分工和制造机械的现代工业）的讨论。抽象劳动发展为生产价值、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而具体劳动则发展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或者更简单地说，发展为“生产力”。裂缝之所以可被视为对抽象劳动的反抗，意味着这两种类型的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活生生发生着的对抗。如果我们向马克思提问，如何理解这些对抗与资本主义裂缝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就必须厘清，在《资本论》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活生生发生着的对抗。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对立，但人们通常把这种对立理解为一种包含性的对立，即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在资本主义中，具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比如我的烘焙是以一种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活动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形式通常被理解为完全的包含性关系而没有任何剩余，也就是一种单向的支配关系。由于具体劳动只是包含在抽象劳动中，所以它被视为一个不值得注意的范畴。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时候，烘焙当然是作为一种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存在，但也有一些时候，当我烘焙时，我会与这种抽象的冷漠作斗争，并试图重新获得快乐，甚至有一些时候我

会说：“让市场见鬼去吧！”我要尽己所能做一个真正好的蛋糕——这恰恰是一个反对抽象劳动的裂缝。换言之，当我们说某物以某物的形式存在时，我们必须将其理解为与某物的形式对立和超越形式的意义。说具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就是认为抽象劳动是具体劳动的存在方式。换言之，抽象劳动被认为是对具体或有用劳动的特定性质的否定，我们可以说具体劳动存在于“被否定的形式”^①之中。但它不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被否认置之不理：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的被否认作出反应，最终推动并超越这种否认。

因此，具体劳动也存在于反对和超越抽象劳动的活动之中。我们都知道，在抽象劳动中具体行为是如何存在的，也就是我们的日常行动是如何服从于抽象劳动的迫切需要的（换句话说，服从于赚钱的需要）。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对立的过程：我们争取对自己活动的自决（做我们想做的事）和做我们为了赚钱而必须做的事情之间的对立。在此过程中，具体行动的存在对抽象劳动的反对被经历为一种挫折。具体行动也超越了抽象劳动的形式，它存在于我们个人或集体成功完成我们认为必要或可取的事情的时刻或空间之中。虽然抽象劳动使具体行动隶属于自己，但它并不能完全包含具体行动：具体行动不仅存在于抽象劳动的形式之中，而且还存在于抽象劳动形式之外，甚至超越了抽象劳动。

这是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吗？显然，这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马克思的著作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他重新揭示了这些政治经济学范畴，并表明它们是非历史性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对立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历史特定形式。更加重要的是，他重新揭示了劳动这一范畴，并表明它包含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整部《资本论》可以被视为从具体劳动的角度出发对抽象劳动的批判：正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叙事中并不突出。而在当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背景下重新解读马克思，就迫使我们必须关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并质疑（无论是支持马克思，还是反对马克思或超越马克思）抽象劳动与具体行动之间对抗关系的本质。

四、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抽象劳动的危机

这一切都有一个谜。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写道，劳动的二重性质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他书中最好的两个观点之一。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然而，显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分析解读《资本论》，但马克思宣称的核心论

^① Richard Gunn, *Again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m as a First-Order Discourse*, in Werner Bonefeld (ed.), *Open Marxism II: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 14.

点却几乎被完全忽略了。诚然，近年来劳动二重性的关注有所增加，但即使如此，重点也几乎完全集中在抽象劳动上，而非劳动的二重性。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刻意忽视？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要归咎于马克思本人的批判风格，在《资本论》中，他从被压制的具体劳动的角度向外看进行叙述。然而，这似乎并不能作为一个完全充分的解释：这种刻意忽视不能用缺乏学识来解释，必然有一些社会性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劳动的二重性必然导致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双重性。资本主义建立在两种对抗之上。第一种是我们已经将其描述为关键的对立：将人们的日常行动转变为抽象的、生产价值的劳动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与原始积累有关，即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历史性积累创造，但将这些斗争（或原始积累）归于过去是错误的。将劳动纪律强加于我们的活动的斗争是资本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经理、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等无一例外。只有在这种第一级对抗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第二种对抗。只有当人们的行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时，才有可能剥削他们。主体行动被转化为生产价值的劳动，然后我们不仅被迫生产与我们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等值的交换价值，而且被迫生产供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第二种对抗，即剥削的对抗，取决于第一种对抗，即抽象的对抗——先将具体行动转化为抽象劳动。

因此相应地，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冲突。一种是具体行动同它自身的抽象化作斗争，换言之，反对抽象劳动：这是反对劳动的斗争（因此也是反对资本的斗争，因为正是劳动创造了资本）。另一种是抽象劳动与资本的斗争：这是劳动的斗争。后者是劳工运动式的斗争；前者是有时被称为另类工人运动的斗争，但它绝不局限于工作场所。反对劳动的斗争是反对一种有别于行动的抽象劳动构成的斗争。当我们把裂缝说成是对劳动的反抗时，我们显然是在谈论前者，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即反对生产资本的劳动的斗争。这两种类型的斗争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至少直到最近，与资本的斗争一直是由抽象劳动主导的。这意味着这些斗争都是由官僚组织形式和拜物教思想主导的斗争。

抽象劳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组织以工会为中心，工会为雇佣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工会斗争通常被视为一种经济形式的斗争，需要辅之以政治斗争，即通常以面向国家的政党形式组织起来。劳工运动式的“改革派”和“革命派”的理念中都存在着这一基本方法。抽象劳动式的反抗组织通常是等级制的，这往往导致压迫剥削在劳工运动的组织中重现。劳动的抽象化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商品拜物教是一个将我们生产的产品与生产过程相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生产的产品不是被视为主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是被视为一系列支配主体行动和思维的主宰。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拜物教化或物化。在我们的行动和思维中，行动的中心地位被“物”（社会生产的物化）所取代，如货币、资本、国家等。劳工运动（作为抽象劳动的运动）

通常接受了这些事物。例如,劳工运动倾向于接受国家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自我呈现(而不是将其视为抽象劳动的组织)。正是抽象劳动导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革命理念。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斗争运动被困在一座由组织和概念所编织的“监狱”中,最终有效地扼杀了任何革命性变革的希望。

因此,正是抽象劳动(或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支配,解释了为什么统一的劳动概念主导了劳工运动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劳动双重性质的重要性几乎被完全忽视。最近的马克思主义学界试图通过回到对抽象劳动的讨论来克服这一遗留问题,但仍然没有认真对待劳动的双重性质的另一面。现在,如果我们坚持回到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重要性之中,那仅仅是因为以抽象劳动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劳资之间的斗争)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反对抽象劳动的斗争,也就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工人斗争的危机迹象显而易见:世界各地工会运动的衰落、致力于激进改革的社会民主党派的式微或实际消失、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拉丁美洲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仅仅体现在大学内部的理论讨论中,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斗争理论似乎正面临着巨大考验。这一切都被视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性挫败,即使是“左派”也同样如此认为。但是,也许这场失败更应该被看作是劳工运动式抵抗的失败,因为这场运动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抵抗运动的失败,也就是劳工与资本斗争的失败,但也可能是反对劳工运动式抵抗的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失败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失败,而是一次向更深层次的阶级斗争的转变。换言之,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正让位于反对和超越抽象劳动的阶级斗争。

抽象劳动的危机可以被视为是我们不愿被资本主义改造成“机器人”的一种体现。资本积累具有一种内在动力,即为了保持其盈利能力,迫使资本不断提高剥削率。为了利润增殖的第一需要,资本要求主体行动更加服从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基本上是马克思在其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中所论证的)。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里(特别是自1968年以来),反对资本的斗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这种逻辑不断侵犯我们的生活和行动的多重形式的反抗。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是我们的不服从,我们拒绝让我们的生活完全服从资本的逻辑,更拒绝将我们的所有行动转化为抽象劳动。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也可以看作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然而,生产力不应被理解为“物”,而应理解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即我们的社会力量。我们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方式不是通过创造更大的生产单位,而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裂缝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人们宣称不会让他们的生产力被资本包围,而是以他们认为必要或可取的方式行事。反对抽象劳动的“行动式抵抗”运动始终作为反对并超越劳

工抵抗式运动的地下性、颠覆性潮流而存在。“行动式抵抗”运动推动了社会自治主义的创新，其组织形式通常是反自上而下的，且面向所有人的积极参与。

由于具体行动还只是停留于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层面，因此这场运动在性质上往往还显得有些混乱和破碎化，总体上呈现为一场为了争取“多元性组成的世界”而奋斗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思考：即认为这些斗争是不连贯、不相关的，是基于许多不同身份的斗争，是差异性的斗争以及为了差异化而斗争的运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具体的创造性行动具有无限丰富的潜力，但它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将行动抽象化为劳动的资本逻辑。因此，重要的是要从矛盾而不仅仅是差异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场运动是人类创造力（我们的创造能力，即“生产劳动的社会力量”）与它自身的抽象性，即人类创造力退化为“价值—货币—资本”的灰色生产所进行的斗争。

五、结 语

本文的观点力图表明，为了真正理解自治主义运动，我们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但这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吗？我想是的。从当前斗争的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就是要将重点从剥削转移到抽象：这并不是将抽象的讨论视为剥削的前奏，而是将剥削视为抽象核心问题的发展。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将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束缚在一种已然衰落的阶级斗争形式上。如此抛弃马克思，既失去了他激动人心的共产主义计划的丰富性，也会丧失对我们的斗争而言至关重要的连续性。也许最糟糕的是，抛弃马克思就是迷失自我，使围绕我们斗争的问题变得模糊，最终为我们再度融入我们先前拒绝的体系铺平道路。

从本文提出的观点来理解自治主义，就是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统治的裂缝，换言之，将其视作抽象劳动编织的凝聚力结构的裂缝。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自治主义运动不是一种时尚，也不是阶级斗争软弱的标志，更不是一堆碎片，而是对构成抽象劳动危机的人性的行动式推动。因此自治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的“行动式抵抗”运动是抽象劳动的危机，而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场危机的最终结果。

（责任编辑：吴瑞敏）